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重新思考「運動軌跡」：台灣、南韓的勞工與環境運動

Rethinking Movement Trajectories: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doi:10.6676/TS.2008.16.1

台灣社會學, (16), 2008

Taiwan Sociology, (16), 2008

作者/Author：劉華真(Hwa-Jen Liu)

頁數/Page：1-4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76/TS.2008.16.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重新思考「運動軌跡」： 台灣、南韓的勞工與環境運動

劉華真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過去三十年來，台灣與南韓的勞工運動有類似的發展路徑，都致力於擴充運動能量並實現勞動階級的集體利益；而兩國的環境運動也有極為類似的運動軌跡，但非常不同於勞工運動所經歷的路徑。為了解釋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竟能如此一致地觀察到勞工與環境運動的軌跡差異，本文將運動軌跡視為「開展特有的運動實力」與「克服伴隨運動擴張而來的內外阻礙」的雙重過程，以「運動實力」這個概念為出發點，主張運動實力由「制衡力」與「理念力」構成，勞工與環境運動的不同運動軌跡，主要源於兩種運動企圖極大化的運動實力類型不同。勞工運動在經濟領域追求制衡的力量，而環境運動將火力集中在散播新環境價值與意識形態。但是這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一方面改變了勞工與環境運動的內部生態，再者引起運動敵手不同型態的反撲，進而導致勞工與環境運動個別力量的流失，工運的制衡力與環運的理念力不斷弱化。勞工運動是在制衡力被削弱的危機之下，才轉向進行意識形態鬥爭，企圖打破孤立與污名化的困境，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只顧私利的運動，更代表了廣泛的普世利益。環境運動在說服所有人環境、生態保護的重要性，並促成各種環境行政體制的設立之後，卻面對越來越多環境論述上的競爭者，包括來自國家與企業界，於是在環境議題主導權流失的脈絡下，轉向鞏固草根力量，並企圖解決隱含於環境議題中的種種經濟與利益衝突。

關鍵詞：運動實力、運動軌跡、制衡力、理念力

Rethinking Movement Trajectories: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Hwa-Jen L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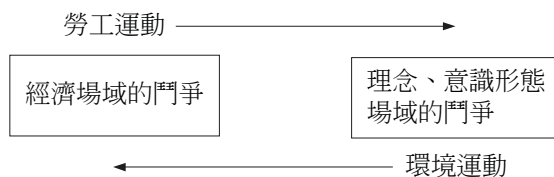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struggles of labor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o increase their power and realize their constituents' interests have followed a similar path over the last 30 year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lso followed a similar path, but a very different one from that of labor movements. To explain why these two different national settings produce consist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jectories and strategies of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conceptualizes "movement power" as being composed of a combination of "leverage" and "ideological power."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sequences of movement strateg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labor initially seeks to maximize its economic leverage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focus first on ideological power. After initial successes, both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nfront new obstacles that undermine the power they previously gained. The state and capital defame and organizationally undermine the labor movements' support bas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learn to compet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for discursive control over ecological values. Labor strives in turn to increase its ideological power by shedding the bad name of "sectional interest" and winning the support of less-privileged wor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struggle to increase their leverage by building a united front with disprivileged victim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Thus, in each case, the sequence of strategies converges around efforts to combine leverage and ideological power.

Keywords: movement power, movement trajectory, leverage power, ideological power

一、前言與問題意識

本文以台灣與南韓為參照案例，意圖解釋勞工與環境運動獨特的運動軌跡。為什麼在過去三十年裡，兩國的勞工與環境運動呈現非常類似的發展軌跡，¹但兩組運動共享的發展軌跡截然不同（見圖一）？即便有著一定的地理距離、運動發生的時點也有所不同，台灣與南韓的勞工運動均起始於個別勞動場所內的經濟鬥爭，發動針對薪資水準與勞動條件的抗爭行動；但在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讓步之後，勞工運動轉向理念、意識形態的鬥爭，企圖爭取邊緣勞工與社會公眾的支持。反過來說，台灣與南韓在由農轉工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環境運動均起始於如何界定發展、公害、污染的理念鬥爭；而在成功地讓「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成為公共論述與日常語言的一部分之後，兩國的環境運動重新集結草根力量，以對抗更細緻的企業行為與環境議題中隱含的各種社會不平等。簡而言之，勞工運動先發動經濟戰，然後朝向「為普遍公眾利益發聲」的理念鬥爭；環境運動始於理念戰，接著是在一個充斥不平等的物質世界裡實現其環境和生態的想望。



圖一 勞工與環境運動的發展軌跡

勞工與環境運動有各自的運動軌跡這件事，基於兩個原因始終沒有成為顯著的研究問題。第一個原因是單一運動研究本身的限制，由於缺乏對照組，很容易將該運動的發展歷程視為理所當然。Eric

1 「軌跡」(trajectory)一詞或許和一般社會運動文獻中的「發展」相類似，但作者特別借用這個物理學的概念來說明，軌跡的形成除了外在力量的推進，和這個移動中物體本身的重力(gravity)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運動軌跡的追尋，必須同時回歸到對個別運動特性的理解。而這個特性，在本文中所指涉的就是運動實力。

Hobsbawn (1967)寫的英國十九世紀的勞工運動、Walter Korpi (1978)筆下的瑞典、David Montgomery (1995)描述的美國、Gay Seidman (1994)比較的巴西與南非勞工運動，基本上都呈現從經濟到政治鬥爭的轉折，勞工運動先針對工資、勞動條件進行抗爭，然後邁向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同樣的，其他國家的環境運動，也是從界定一個不熟悉、新出現的污染問題開始，然後逐步朝向處理環境問題中的經濟不平等的議題，從美國的 Love Canal、日本的痛痛病、巴西亞馬遜叢林的橡膠開採、印度的反水壩運動、還有各國的環境正義運動，都呈現出由理念鬥爭到經濟鬥爭的轉變。Marc Bloch 早在 80 年前就指出個案研究——不論是單一國家或單一運動——容易將經驗現象「自然化」(naturalize)，「對任何科學分枝來說，還有比將所有事情的發生視為『自然而然』更危險的誘惑嗎？」(Bloch 1967: 67)。他也建議透過比較研究來深化議題，矯正個案研究中過度一般性的假說。

第二個原因則是，企圖標定不同類別運動特性(movement specificity)的歐洲新社會運動理論，因其「新」「舊」、「認同」、「利益」、「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的武斷劃分，已經被經驗研究所駁斥(Calhoun 1993)，也在過去二十年與美國社運理論的鬥爭中，明顯挫敗。這項挫敗影響所及，使不同運動間的差異性以及個別運動的獨特性，成為被冷凍的研究議題。而銅板的另一面，正因為輕忽運動特性以及不同運動的歷史脈絡，使得根據兩、三個運動（最主要的是美國民權運動、義大利的共產黨運動）所提煉出來的研究成果（如機會結構、動員模型、框架理論、鬥爭政治等），被過度概化成一般理論而廣泛運用在不同歷史時段、不同區域、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上，而社會運動研究的這種傾向，已有許多論者從不同角度提出警語(Goodwin and Jasper 2004)。本文的目的，一方面肯定「尋找不同運動獨特性」是值得保留的研究傳統，另一方面也企圖指出，雖然所有的社會運動皆同時涉及「認同」與「利益」、身分認同與物質經濟的鬥爭，但放在個別運動的發展路徑來看，什麼階段以何種鬥爭為優先，什麼原因導致鬥爭路線的轉換，更是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勞工與環境這兩條截然不同的運動軌跡？作者在本文中將運動軌跡視為「開展特有的運動實力」與「克服伴隨運動擴張而來的內外阻礙」的雙重過程，並主張「運動實力」(movement power)這個概念是解釋「運動軌跡差異」的起點。運動實力這個詞，如果對照 1970 年代美國政治學家的「權力辯論」(the power debate)，它所指的不是一般認知下有權者(the powerful)在行使的權力，而是社會中的弱者用來和更有權勢的對手協商、對抗的力量。再者，運動實力的行使者是集體，而非個人。如果更深入去看運動實力這個詞，作者認為它基本上有兩個層次。在第一個層次上，它所指涉的是運動成員基於運動本身的結構性位置，被賦予特殊的能力來與對手互動、協商，這是一種「潛在的實力」(potential power)，無關於這種力量被實現與否。在第二個層次上，運動實力指的是「議價實力」(bargaining power)，意指在運動出現之後，處於權力天秤弱勢的一端實際用來逼迫對手協商、讓步的力量。第一個層次會關注不同類型的運動實力，第二個層次則是運動實力的大小。

既有對運動實力的討論，許多人都指出弱勢者(the powerless)通常使用抗爭手段——負面誘因和威脅——來迫使有權者進行協商(Lipsky 1968; Wilson 1961)。Gene Sharp (1973: 4)指出不合作運動(nonviolent action)之所以有效，它的前提在於「權力行使立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一旦被統治者撤回其同意，即可摧毀對手的權力」。Frances Fox Piven 與 Richard A. Cloward (1979: 310)在討論「制度騷亂」(institutional disruption)時也指出：「底層抗議者仍有造成影響的可能性……一旦他們的行動破壞規則，並擾亂了某些權貴團體所仰賴的制度運作時」。Richard Flacks (2004: 114)更明白提出：「弱勢者的權力根植於他們有能力破壞平穩進行中的社會生活」，以及「社會運動……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企圖極大化其支持者實力的社會構成」。

在本文中，作者擴張了既有對運動實力的討論，認為至少可以區分出兩類運動實力：制衡力(leverage power)和理念力(ideological power)，而勞工與環境運動最清楚地展現這兩種運動實力的動態。在

既有的理論和經驗文獻中，這兩種運動實力有非常豐富的討論，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企圖結合此二者來解析社會運動的發展軌跡，而這也是本文用來解釋工運與環境運動軌跡差異的關鍵。

制衡力是一種位置性的力量(positional power)，預設了制衡力的持有者和他們的對手是處在一個相互依賴——雖然不對稱——的關係中，而且前者的合作與順服是這個關係能夠維持與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因為這個「位置性」(positionality)，制衡力只對特定對象有效，而且受縛於特定情境(context-bound) (Lukes 2005: 75, 79)。勞工可以在工廠裡罷工，學生可以占據行政大樓來對抗大學當局(Heirich 1971)，低階辦公室白領可以隱匿訊息來癱瘓正式組織的運作(Mechanic 1962)；一旦抗議對象與情境轉換，他們的制衡力並不會自動轉換且維持其效力。在這個意義上，勞工運動的實力基礎在於工人的結構性位置。工人的勞動力是讓整個生產體制得以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當工人集體拒絕提供勞務，將直接妨礙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勞動力的不可或缺性，是資本家願意讓步的關鍵，工人階級行使這種結構式的制衡力量(Silver 2003; Wright 2000)，導致國家與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經濟讓步。北歐國家的歷史經驗(Esping-Andersen 1985; Korpi 1974; Korpi and Shalev 1979)與美國新政時期的政策(Brenner 2007)均支持這一論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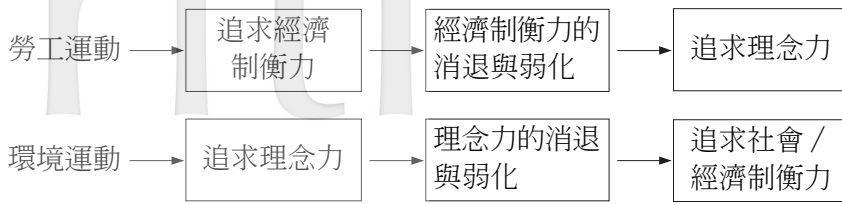
理念力是從意識形態這個字所延伸出來，指的是理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或更精確地說，是由「能激發、組織分散人群的集體意志的具體夢想」(Gramsci 1971: 126)所產生的力量。Alberto Melucci 對當代社會運動的描繪，也指向理念力的浮現與實踐：「他們〔社會運動〕所擁有的……是話語的力量……他們訴說著一種似乎完全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但他們所說的一些東西，超越他們的特殊性，訴諸社會全體」(Melucci 1996: 1)。一個社會運動的理念力，是在主流價值、強勢意識形態的浪潮之下進行說服工作，以扭轉信服舊價值、舊理念的大眾意見。這項說服工作的有效性，一方面受制於不同運動的論述能力，一方面仰賴和不同群體接觸所使用的溝通工具，例如全國

性或地方性的報紙、雜誌、廣電媒體。如同 Goran Therborn (1980: 80) 所說：「〔意識形態〕總是在具體限定的社會情境中，透過特定的溝通工具與行為而被生產、傳達與接收，這些溝通的物質特性影響到任一意識形態的效力」。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環境運動的力量，在於以普世價值與集體利益來說服社會大眾、甚至運動的敵手接受這種新的意識形態。過去三、四十年來，環境運動是非常少數得到廣泛社會支持、並把運動的核心理念變成社會主流價值的社會運動。正如某位生態歷史學家所言：「我們都想拯救地球。面對民意調查時，很少人會宣稱他們反地球或支持地球毀滅」(Bramwell 1994: 180)。即便是拒絕簽署京都議訂書的小布希，仍然在美國提出藍天法案(Clear Skies legislation)和其他和氣候變遷相關的政策。環境運動所展現的理念、說服、意識形態的力量，是這個運動最關鍵的特徵。

這兩種運動實力的優缺點都清晰可見。立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勞工的結構性位置所延伸出來的制衡力，給予勞工運動行動與組織的動力，但這種力量既無法從工作場所輕易轉換到不同情境中使用，也常讓人認為工人所行使的制衡力只是為了服務某些狹窄的特殊利益。相對來說，環境運動以理念力深刻地改變了公眾思維與生活模式，但普世理念與論述並不足以使跨階級的運動組織及聯盟，長期有效地運作下去。

一旦認知到不同類型的運動實力基礎，勞工與環境運動不同的發展軌跡可以被視為他們各自不斷極大化某類運動實力，以及克服各種障礙的過程，因為：(1)勞工與環境運動主要行使不同類型的運動實力，並且會極大化不同類型的運動實力；(2)對手回擊制衡力和理念力的方式，以及所造成的運動困境也會有所不同；(3)最後，勞工與環境運動也會以不同策略回應極大化這兩種運動實力所造成的不同後果。考量以上三點，勞工與環境運動的不同軌跡將可以得到適切的解釋，而且可以看到這兩條軌跡呈現有趣的對比（見圖二）。

勞工運動最初在經濟領域中追求制衡的力量，而環境運動將火力集中在取得論述能力，來散播一套新的環境價值與意識形態。但是這



圖二 從運動實力的角度看勞工與環境運動軌跡

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一方面深刻改變了勞工與環境運動的內部生態，再者引起運動敵手不同型態的反撲，進而導致勞工與環境運動個別力量的流失，工運的制衡力與環運的理念力不斷弱化。勞工運動是在面對制衡力被削弱的危機之下，才轉向意識形態鬥爭，企圖打破被孤立與污名化的困境，證明工運不是只顧私利的運動，更代表了廣泛的普世利益。環境運動則是面對來自國家與企業界、越來越多環境論述上的競爭者，面對環境議題主導權的流失，進而轉向鞏固草根力量、擴大組織基礎，並解決隱含於環境議題中的種種利益衝突。

在簡要提出本文的主要論點之後，以下將針對勞工與環境運動軌跡進行比較細緻的經驗分析。作者將在第二節分析台灣與南韓工運的發展歷程，第三節分析兩國的環境運動，最後在結論部分，指出把分析重心放在「運動實力」這個概念上，對運動長程發展的討論有何理論意涵。

本文的研究使用了多種一手和二手資料，其中包括：(1)1971 到 1988 年間中國時報全國及地方版所報導的環境抗爭事件；(2)1971 到 1995 年 Korea Times 與 Korea Herald 所報導的勞工、環境抗爭；(3)關於勞資爭議、罷工、參與工人數、損失人日數的勞動統計資料，來源包括台灣與南韓的官方勞動統計與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4)1950 到 2000 年間約四千筆勞動、環境相關報導，由檢索聯合資料庫與 Korean Integrated News Database System (KINDS)所得；(5)運動刊物、傳單、十八部運動紀錄片；(6)作者深度訪談 68 位台灣與南韓的工運、環運運動者及學者，約 140 小時的錄音訪談；(7)2002 到 2004 年間作者在台灣與南韓進行調查時的田野筆

記，包含非正式交談、小團體討論，抗爭事件現場記錄等等。

二、工運軌跡： 從制衡力到代表普遍利益

翻開台灣與南韓戰後的勞工運動史，基本上是由 1960 年代出口導向工業化中的非技術性工人，尤其來自紡織業與其他勞力密集產業，發動第一波的勞動抗爭。基於以低價取勝的生產原則，勞動條件極其惡劣，薪資極度壓低、超長工時、強制加班，以及頻繁的職業傷害。以勞工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來說，這是一個和法國、德國、美國、英國完全不同的歷史起點。歐洲、北美早期的勞工運動，是以整個工匠組織(craft unions)、工匠文化(artisan culture)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Katznelson 1986: 23)。但是，「許多被認定為有利歐洲勞工階級形成的重要文化、制度因素，在南韓是付之闕如的」(Koo 2001: 11)。Hagen Koo 的描述，同樣適用於台灣。

但是勞力密集產業的工人動員，很快就被國家鎮壓，大批工會領袖與幹部被列入黑名單、解雇、逮捕、判刑，自主工會無以為繼。第一波的工潮被壓制的時間點，以台灣來說是在 1989 年左右（王振寰、方孝鼎 1992: 18），而遠東化纖的罷工案——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罷工——的挫敗（趙剛 1995），更是國家壓制行動的指標案例。在遠化罷工案之後，有超過兩百名在民營企業工作的工會幹部被解雇或起訴（吳乃德、廖錦桂 1991，附錄一）。一位台灣的工運幹部說：

民營〔工會〕……一名工會幹部被解雇，那個工會就差不多瓦解了，何況你說〔解雇〕兩個三個，也是被瓦解。台灣工會幹部被解雇而工會沒有瓦解的是少之又少，我估計十個大概只剩下一個，僥倖活下來。（訪談，台北，2003/2/10）

南韓的勞力密集產業工會活動，在 1980 和 1981 年之間被全斗煥

軍事政變後緊縮的勞工政策全面鎮壓。全斗煥的「淨化措施」(purification campaigns)基本上重創了一半以上的既有工會。登記在案的工會，從 1979 年的 4,947 家，到 1980 年降為 2,618 家，而 1981 年時僅剩 2,141 家。也就是說，60% 的工會在短短兩年間突然喪失合法地位，成為非法黑戶，其中包括許多活躍於 1970 年代的進步工會，例如被稱為南韓工運之父的全泰壹²死後所籌組的清溪紡織工人工會。

國家暴力鎮壓所造成的挫敗，導致兩國勞工運動出現明顯的策略轉向。新的動員策略是去組織策略性產業——源於 1970 年代的工業深化政策(industrial deepening strategies)——工人加入勞動抗爭，諸如汽車、造船、石化、郵政、通訊產業。以台灣來說，組織國營事業、上游產業的勞工，是在遠東化纖的挫敗後有意識的策略選擇。基於國營事業工會早在 1950 年代就已經被國民黨「先占式」地組織起來（李允傑 1992；李建昌 1991；吳介民 1990），當時的動員策略採取了以選舉手段搶奪既有工會領導位置的模式。一位台灣的勞工組織者說明了這個動員策略轉向的背景：

1988 到 1989 年工運挫敗，因為 KMT 用鎮暴部隊鎮壓遠東化纖，工運變得非常低落，他們就開始，像羅美文，就是解雇、解雇，很多工運幹部都被解雇，這對工運是很大的打擊。那時候工運幹部都不敢動，在工廠組織工會也很低調，工會也不敢運作。那時我的想法就是組訓……台灣工運的土壤是貧瘠的，我們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小企業，雇用都是 30 人以下，雇用 30 人以上的非常少，占不到 30%，要用民營企業來做火車頭是不可能拉得動的，我認為應該去顛覆 KMT 控制的國營事業。要進入國營事業是很困難的，我是有計畫怎麼進去，從每一個工會我都先接觸不到十個人開

2 1970 年 11 月 13 日，南韓紡織工人全泰壹自焚，抗議當時勞動密集產業中惡劣的勞動條件(Cho 2003)。他的自焚激勵了一整個世代的南韓工人與學生投入 1970 年代的民主工會運動。

始，然後幫助他們去搶奪工會的自主性、經營權，電信、台電、石油、郵務，這都是很重要的大型工會。（訪談，台北，2002/11/19）

另一位台灣的工會領導人說：

台灣工運的困境，我們的工會太小了，我們還是算很小的工會，從這個工會能串聯出更多更大的，但串聯非常不易，我發生事情，別的工會不一定能幫得上忙、聲援，就變成跟關門打狗一樣，我永遠是被關在這裡跟人家打，廠場工會局限自主工會沒辦法有橫的力量發展。我覺得去團結這些工會的應該是公營工會，像電信、鐵路、電力工會，去帶動串聯而不是各據山頭，我們不是山頭，我們只是邊陲的小小的，應該是像他們這樣的來串聯台灣的工會，要不然永遠都是你打你的，他打他的，打完了就是這個工會打得好慘，耗了很大的力量、資源，但資源是有限的，一個工會一個工會對抗資方永遠是很困難打的……。（訪談，台北，2003/10/20）

台灣國營事業勞工之所以積極回應這一波的動員，則是為了反對國民黨的民營化政策，如張晉芬(2001: 107-108)所言：「在解嚴[1987]之後，台灣民間工會抗爭能力轉趨薄弱，但是公營事業工會的自主性和動員力量卻快速增長，延續了台灣工運的活力。很諷刺的是，使得後者增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私有化政策的提出……在解嚴前夕公營事業工會就已經改變過去的順從角色，首當其衝的動作就是爭取成立自主工會」。

在南韓，從 1980 年初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激進學生開始滲透到各個工廠去進行組織工作，而先前被革職的工會幹部³則扮演了居

3 根據全斗煥上台後所施行的工會淨化準則，「十七名全國產業別工會的理事長，其中

間聯繫的角色(Brandt 1987; Koo 2001; Ogle 1990)。雖然絕大多數的組織者是進入勞力密集產業，但因為人數極多，也有部分組織者開始進入財閥(Chaebol)工會(Lee 2001: 449)。而從諸多文獻中，我們亦可發現南韓工運內部構成在 1980 年代中期發生重大變化。如果說 1970 年代支撐工會的主要力量，來自於紡織女工的艱苦奮戰(Chun 2003; Kim 2003)，在 1980 年代中期，以 1984-1985 年的大宇汽車罷工事件揭開新的序幕，男性、重工業技術勞工開始成為南韓勞工運動的行動主體，如 Koo (2001: 111) 所言：「南韓的勞工行動不再被局限在輕型製造業部門，而擴展至以大企業為主的重化產業」。如果組織重化勞工的行動大約開始於 1980 年代初期，「到 1990 年初期為止，南韓大型製造業的組織率幾乎達到飽和」(Koo 2001: 196)，也就是說，在十年以內，策略產業中的男性技術勞工或被快速地組織起來（如現代集團的例子），或者承受極大的工會改革壓力（如大宇的例子）。而 1987 到 1991 年之間，南韓工人呈現於世人面前的形象，是男性勞工開著大型工業器具上街遊行、和鎮暴警察追逐扭打、占據工廠等激烈抗爭。一位從 1970 年代開始參與勞工動員的南韓女性組織者，簡潔有力地道出紡織工人和財閥勞工的差別：

在 1970 和 1980 年代的輕型製造業逐漸裁員，從雇用四、五百人，到三百人，兩百人，一百人。如果你搞一場罷工，其實沒有什麼影響力，也不會引起外面運動者的興趣。但是如果是財閥集團，有任何情況發生，四五千甚至上萬工人罷工，所有〔組織者〕都有興趣……。 (訪談，首爾，2003/4/17)

十一名被迫辭職，一百六十名區域工會領導人和將近兩百名地區工會幹部被逐出他們所屬的工會」(Ogle 1990: 102)。但這項高壓措施卻造成反效果，因為它「製造了更多堅定的工運活動者，他們有著多年的工會經驗但被迫離開他們的工作。因為政府讓他們無法找到像樣的工作，他們別無選擇，只好成為專業的勞工運動者。這些在外部活動的工運份子，在連結跨廠場的工會人士和政治反對勢力上，扮演了吃重的角色」(Koo 2001: 103)。

以上幾位組織者都比較著眼於企業的雇用人數，更深一層來看，除了人數之外，這一波新的勞工動員，針對的是那些處於「保護部門」(Huang 1999, chapter 6)、在勞資關係中更具議價實力的技術勞工。基礎產業如石化、電信如果罷工，對整體工業生產的影響力遠大於紡織工廠的罷工，這也正是台灣國營事業勞工與南韓財閥勞工之所以有更大議價實力的原因。基於這個動員策略的轉向，我們可以發現台、韓勞工運動的先鋒部隊開始改變。在台灣，國營事業工會取代了民營企業工會；在南韓，財閥工會變成工運的火車頭。兩地勞工運動的領導階層大換血，工運的領導權被交託到最具議價實力的一群工人手裡。

隨著領導權的轉移，兩地勞工運動的核心議題也隨之轉變。台灣工運的新課題是阻擋國營事業民營化的浪潮，因為這直接影響了國營事業勞工的權益。一位在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工作的幹部告訴作者：

在全產總裡頭……是工會內部的現實主義……你可以注意到所有真正有實權、動員力強的都在國營事業，他們廠場又大，所以在全產總裡的權力架構是這樣。我們在處理的業務有一半以上是在處理國營事業工會的抗爭，他們的獎金、職工福利金、加班費有沒有按照勞基法發，或是加班補休，或是勞工董事沒有聘，幾乎都是國營事業這個。全產總裡面有五個委員會，其中有一個就是國營事業民營化對策委員會……總的來講，全產總的業務，我估計，有六成是在處理國營事業的事情。（訪談，台北，2002/12/2）

南韓的工運，著力於回應財閥企業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以提升全球競爭力為名而鼓吹的各種降低人事成本的手段，例如彈性雇用、取消年功制、取消終身雇用來規避上漲的薪資與退休金。除了運動議題，台、韓勞動抗爭的場域也有所轉變，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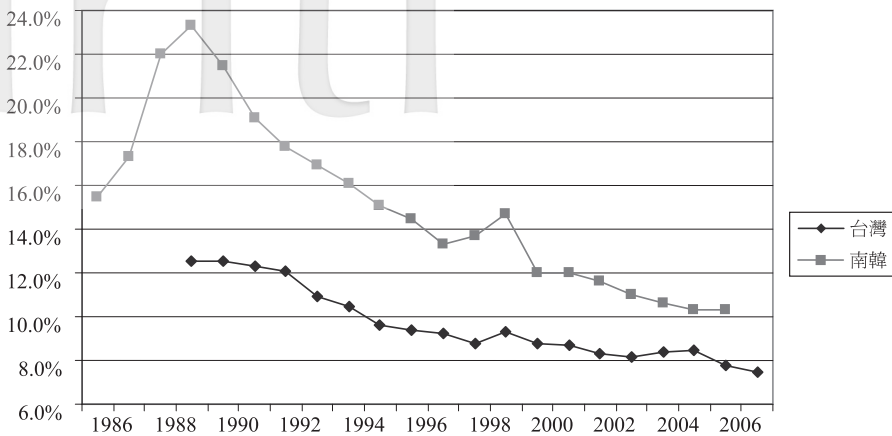
墨。第一，隨著領導權的轉移，台、韓工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在經濟場域上戰鬥，但是鬥爭的內容有所改變，從早期的積欠薪資、拒發加班費、遣散費，轉變為在公共場域對抗民營化政策、新勞雇政策，以及其他傷害勞動三權的修法行動，諸如放寬罷工期間雇用臨時工的規定。第二，雖然台、韓工運持續其經濟鬥爭，鬥爭的層次顯然向上攀升，由過去個別廠場的勞資衝突，轉變為在國家整體政策層次的抗爭。而兩地工運進軍國家政策領域的基礎，正是這群有較佳議價實力的技術勞工所體現的潛在動員力量。

當台、韓工運追逐實力極大化的策略，基於兩地工運先鋒部隊較佳的議價位置，台灣的國營事業員工和南韓的財閥工會會員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讓步。台灣的國營事業員工雖然無法全面阻擋民營化的進程，但他們的集體行動確保了較佳的退休與資遣條款；南韓的財閥工會則透過每年三、四月的春鬥，以高度動員來反抗政府提出「建議薪資綱領」，確保在個別廠場的薪資協商中獲取頗佳的薪資水準與福利。⁴

但是，這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也同時引發了一連串的非意圖性後果。首先，為回應工運增長的議價實力，國家與資本家均以各自的方式進行反制。例如，國家選擇性地開放或限縮新工會組織的成立、調整勞資爭議的相關法令、管制工會聯盟的構成；資本家開始遷廠、大量使用非典型雇用與外籍勞工、開發新的管理策略來規訓勞動現場。論者指出這些作為長期來說都有弱化工運實力的效果(Yu 1995)，對此本文特別針對弱化工運組織基礎的角度來分析。一個最簡單的指標就是台、韓的勞工組織率（見圖三），⁵在歷經勞動抗爭的高峰期後呈

4 Lee (2009)指出，從 1986 到 2004 年間，南韓薪資協商的結果，造成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員工薪資差距的擴大。在 1986 年，雇用少於 30 人的中小企業與雇用超過 500 人大型企業的平均薪資比是 100：111，但到了 2004 年擴大成為 100：171。

5 組織率=工會會員數/受雇人數×100。台灣的部分僅包含產業工會的會員數（基於產業工人在台灣勞動抗爭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沒有採用台灣官方公佈的組織率資料，是因為官方數據在分母的部分直接排除法律上不允許籌組工會的教師、公務人員等，以致於組織率的數值過度高估。在此作者採用各國一般通用的計算方式來重估台灣的組織率。



圖三 台、韓勞工組織率

資料來源：南韓的資料來自勞動統計 <http://www.kosis.kr/eng/index.htm> 與 <http://www.nso.go.kr/eng2006/emain/index.html>；台灣的部分，是勞動統計中的產業工會會員數與主計處的歷年受雇就業人數。

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隨著三級產業擴張、遷廠、彈性雇用的企業策略，二級產業勞動人口占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遞減，南韓的工會會員數雖然有所增加，但組織率從 1989 年的 23.3% 下降到 2006 年的 10.3%，台灣產業工會會員數則在過去 20 年裡減少了約一百萬，組織率從 1989 年的 12.5% 掉到 2007 年的 7.4%。也就是說，在最具有議價實力的產業工人於兩國分別取得工運主導權後，既有的組織基礎開始流失，而隨著非傳統產業工人數量的大量增加，仍以產業工人為主的勞工運動所能發揮的號召力也不斷被稀釋。

其次，國家、資方與媒體攜手合作，開始強勢的論述戰，把勞動抗爭描繪成「犧牲公眾利益的自私行動」。台灣的反民營化行動，被描繪成一群腦滿腸肥的國營事業員工無視於經營赤字與缺乏效率等問題，一心只想逃避市場競爭的檢驗。這些反勞工訊息的強力放送，不令人吃驚的，使反民營化抗爭孤立於公眾的支持（張晉芬 2001: 215-6）。在南韓，主流媒體更是口徑一致，譴責這群貪婪、非理性的勞工貴族，明明已經享有高薪資水準，還每年使用暴力手段爭取更高的薪資，絲毫不顧他們的行動嚴重傷害了南韓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

力。一到每年薪資協商的春鬥季節，勞動抗爭總是被大加鞭撻，以下是兩則經典的新聞評論：

〔南韓〕民主勞總究竟要強橫到什麼地步？連外國媒體都在說韓國政府和企業都只能看這些鷹派工會的臉色？這些工會已經變成韓國經濟不穩定的禍首，沒有外國資本會盲目到願意來投資一個工會總在街頭打架放火的國家。(Chosun Ilbo 2003/11/11)

最讓人擔憂的是，上半年還維持在美金 26 億水準的外國直接投資，急速下降。外國投資的總量，從 2000 年 150.2 億的高峰，跌到 2002 年的 91 億。不令人吃驚的，當 *Financial Times* 以頭版登著韓國工人的罷工照片，他們手拿鐵棒木棍，阻擋工廠的出入，以及 CNN 播放著韓國工人上大街總罷工，我們可以想像這對外國投資人造成什麼影響。(Korea Herald 2003/9/3)

翻開南韓的報紙，總是可以看到「韓國人不願意再忍受工會抗爭」的標題，或者高漲的薪資致使企業倒閉的報導。所謂的「不列顛疾病」(the British disease)被廣泛用來描述激進勞工運動所帶來的負面後果，而「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則被當成對付勞工運動的萬靈丹 (Shin 2003: 161)。以下是作者訪問民主勞總政策中心時，和一位組織者的對話：

問：一般韓國人怎麼看待工運？是好的印象還是壞的印象？

答：（哈）這只是我的個人意見（停頓良久）不是正面的形象。

問：為什麼？

答：（停頓更久）為什麼？因為很多人還是很保守，他們怕工運，他們怕民主勞總，一些自由派的人還有一般人認

為民主勞總還有我們的工運太激進，他們會說「我支持工運」，他們會說「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工運很重要」，但是他們要我們採取溫和一點的手段。（訪問，首爾，2003/4/24）

除了資方新的經營管理策略，國家、媒體聯手的意識形態戰，從外部為台、韓工運創造了新的困境，工運內部也面對新的困難，特別是在彌平「優勢」和「弱勢」勞工間的鴻溝上(Jung 2000)。隨著勞動類型的多樣化，工運內部協調不同類型工人利益的成本與困難也提高。再加上台、韓工運花了最多的時間精力來處理國營事業勞工和財閥企業工人的勞動條件，致使許多激進的工運份子指控工運的領導階層漠視弱勢工人的利益與需求，例如外勞、失業、女性勞工、非典型雇用等。以台灣來說，從 1990 年代初期，因為關廠歇業或工廠外移所造成的失業潮已經成為迫切的問題；在 1990 年開放引進外勞之後，外勞在台人數從 1994 年的近 14 萬人，到 2008 年為止增至 37 萬人，占台灣勞動人口 2.5% 左右。然而國家政策和雇主對外勞勞動權有諸多不合理的管制，使得如何保障這群工人的權益成為另一項重要議題。但失業與外勞問題在當時並沒有受到以國營事業為主的台灣主流工會的關注。至於在南韓，非典型雇用基本上在 1980 年代後期已經引起許多女性組織者的關注，根據韓國勞動研究院的一項研究指出，從 1993 到 1997 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短短四年之間，非典型雇用的人數增加了一百萬，到了 1999 年，非典型雇用的勞動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 50%，而且逐年增加中(Ahn 2001)。⁶ 但是勞工運動的領導階層完全漠視這個議題，當勞資政三方協商同意在某些產業放寬非典型雇用時，財閥工會只顧著捍衛會員所在的產業，結果開放的產業都是以女

6 非典型雇用在台灣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柯志哲(2008)分析勞委會 2002 年非典型雇用的調查，指出國內企業有四成使用至少一種非典型工作安排（部分工時工、定期人員、派遣工、外包工），而 75% 已經採用非典型雇用的企業表示會持續或增加非典型工作者的使用。雖然非典型雇用在台灣已被廣泛使用，但目前缺乏全國性的調查資料可以指出非典型工作者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

性為主和工會化程度很低的產業。等到南韓工運的領導層開始正視非典型雇用的問題，已經有接近 60%的勞動人口屬於非典型雇用，「已經太晚了」（訪問，首爾，2003/4/8）。在女性勞工的處境上，一位組織者說：

讓我們看看有組織工會的這一塊，其中只有 5%的女性勞工被組織起來，95%沒有被組織。如果跟女性勞工做比較，大企業的工會像是地鐵工會、現代企業工會呀，他們是中產階級、上層階級，而且民主勞總的錢是從這些大工會來的……但是我們沒辦法只是抱怨民主勞總或韓國勞總不努力組織女性勞工，我們不能等了，現在 75%的女性勞動力屬於非典型雇用。（訪問，首爾，2003/4/17）

綜合以上所言，這個運動實力極大化的策略，一方面確立了台、韓工運作為政治行動者的地位，但是他們的名聲卻因此被高度污名化，而賴以支撐工運的制衡力，也因為國家與資方的新舉措而不斷流失。面對這些內外挑戰，台、韓工運也開始做出一連串的回應。兩地勞工運動開始努力去除「利益團體」的污名，並企圖走出企業工會的限制，一方面整合紛雜的工人利益，一方面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台、韓工運再度的策略轉向，通常由工運內部激進的勞動團體打頭陣，然後主流工會再緩慢跟進。

以台灣來說，勞動團體開始糾結聚集，逼迫政府修改以往「只為滿足雇主利益，但罔顧人權」的外勞政策，並且在引進外勞的同時，必須有配套措施來處理國內的失業問題（聯合報 1996/4/10）。工運幹部也開始領導失業勞工從事一波波的集體抗爭行動，例如臥軌和在高速公路上遊行撿垃圾（聯合報 1996/12/21）。這些行動，也迫使主流工會必須在勞資政三方參與的經發會中，要求外勞總量管制以及提出解決國內失業的相應政策。勞動團體也推動一系列的勞工保護法律的修訂與立法行動，包括〈大量解雇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就業服務法〉、〈團體協約法〉、〈就業保險法〉、〈勞動檢查法〉等等，⁷而這些法律行動也受到主流工會一定程度的支持。在組織行動的部分，地方產總開始接受失業勞工成為工會會員，提供會費減半、再就業等相關服務，台塑和中華電信等大型工會也提案通過接受非典型雇用的勞工加入工會。

除此之外，國營事業工會也開始重新整編反民營化鬥爭，不再只著重國營事業工人的飯碗和工作保障，而將之界定為「捍衛國家資產」、「反對官商勾結賤賣國產」。他們主張國營事業每年繳庫的歲入盈餘，實際上被用來支撐政府的福利、教育、基礎建設等公共支出。民營化政策表面上看來打著市場競爭、效率的旗號，實際上是政府在國內外財團的催逼之下，以賤賣國產的方式短期套利，用來支付歷次選舉所開出的政策支票。但長期來講，將基礎產業民營化，除了財團以外，每個人都變成輸家（訪談，台北，2003/1/14）。工會和勞動團體也開始擴展關注的議題，例如：「勞動團體呼籲政府不要受限於財團的壓力而取消證券交易稅和土地增值稅，因為這種減稅方案僅造福少數有錢人，但違反了稅制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原則」（Central News Agency 2001/8/24）。工會領袖也開始將一般社會議題納入勞工教育的課程，並鼓勵工會會員參與其他社會改革行動，如教育、環境、醫療改革、社區營造等（訪談，台北，2003/7/21）。

在南韓的部分，在小型勞動團體的強力要求下，民主勞總開始處理非典型雇用和女性勞工的問題，近年來組織非典型勞工成為民主勞總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一位政策組的幹部說：

我們要怎麼處理非典型勞工？他們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對，
有一千萬非典型勞工在南韓工作，但是他們在哪裡？我們找

7 例如，〈大量解雇保護法〉很明確地是在回應 1990 年中期的關廠、遷廠潮，而〈就業服務法〉一方面意圖將勞動市場上轉業困難的中高齡、低技術勞工納入安排再就業的計畫中，另一方面對可能過度剝削外籍勞工的仲介機構執行約束、管制的功能。這些法令的推動是否能直接擴大勞工運動的社會基礎，仍有待觀察，但最起碼這些修法和立法的努力有間接促進不同類型勞工團結的效果。

不到他們！他們沒有組織，高度分化，統計數字上來說，他們〔非典型勞工〕很大，但是從勞工運動的角度來講，他們很小……但現在組織非典型工人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項目，我們成立了新部門來處理這個問題，從事政策研究等等，在我們所有的公開場合的發言和演講中，非典型雇用是我們的頭號議題。（訪談，首爾，2003/4/24）

主流工會對非典型雇用的態度，可以從春鬥時的某些舉措看出。例如某些財閥工會在薪資協商時，要求企業捐出 5% 的淨利作為協助非典型勞工的特別基金。在性別議題、女性勞工的低度組織化、女性的工會參與層級過低等問題，教師工會已經通過決議，保留 30% 的領導職位給女性，民主勞總也新設立女性勞工的工會聯盟。在其他社會議題的部分，民主勞總的前政策中心主任主張，要有效地處理逐漸擴大的工人差異和勞動條件，同時又要建立工人團結，民主勞總必須更有效地保護弱勢勞工、中小企業工人與非典型工人。除了薪資、勞動條件等短期目標之外，工會也該致力於社會安全網的建構、教育改革、稅制改革、解決房屋供給、環境問題，以及其他和整體社會利益相關的議題(Kim 1998)。工運擴大社會參與、引領公共意見的企圖，更可以從民主勞動黨的成立看出，以下是 2004 年南韓五一勞動節的六大主題：

- 反對世貿組織和自由貿易協定
- 健康的工作環境
- 公共參與
- 從伊拉克撤兵
- 取消正規與非典型勞工的差別待遇
- 勞動三權

在此我們看到這兩國工運的合流。為了極大化經濟制衡力，運動的領導權被逐漸轉移到最有議價實力的工人手裡，運動的主要議題也直接反映這群工人的經濟利益。但在此同時，國家與資方的舉措、利

益團體的污名、勞工階級的內部分化也逐步弱化兩國工運的議價實力與支持基礎。於是，台、韓工運都進入論述、意識形態的鬥爭場域，開始協調不同類型工人的利益與需求，更廣泛地參與社會改革，尋求新的結盟機會。要協調工人階級內部的多重利益是艱鉅的工程，但建立工運與公共領域有意義的連結似乎是更困難的工作。這種自我轉化的努力，依靠不停的協商來化解各方的疑慮和抵制。許多人批評台、韓的主流工會只是嘴上說得好聽，並沒有真正把資源和精力放到協助弱勢勞工上。一位民主勞總的政治顧問說：

很多外國觀察家都說民主勞總展現了「社會運動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和許多運動建立了很強的團結感，像和平、反戰運動等等。但是，這只在工會聯盟(confederation)這個層次，在企業工會的層次，工人根本不關心這些議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在企業工會的層次，工會和社會運動組織有時是相衝突的。(訪談，首爾，2003/4/5)

超越經濟自利行動的困難度是眾所周知的，但另一位民主勞總的組織者說：

〔財閥企業工人和中小企業工人的差距〕是一個大問題，也是我們必須克服的問題，財閥工會工人針對的是老闆，但中小企業工人針對的是國家政策，他們的敵人不同，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沒辦法組織或協調他們之間的差異，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成功，但是我們還在試，還在努力。(訪談，首爾，2003/4/24)

三、環運軌跡： 從理念力到重新連結草根

戰後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皆源於快速工業化中的污染問題 (Hsiao 1999; Lee 1999)。兩國早期的環境抗爭，基本上都是污染受害者與都市知識份子的鬆散組合，以及知識份子很快地就在運動中取得主導的地位，污染受害者則逐漸淡出這個聯盟關係。這個發展的原因有兩方面，首先是知識份子對於污染受害者要求鉅額污染賠償等「自利行為」的疑慮，⁸ 這樣的行徑基本上與「環境運動是在捍衛普世價值與利益」的宣稱相衝突。以下的報導或多或少點出了這兩者的衝突：

「自力救濟」不能與「環保運動」混為一談，新環境基金會董事長柴松林昨天指出，國內太多「利己」的反公害抗爭，也美其名為「環保運動」是不適當的，他認為，「環保運動」應是「利他」的社會運動，兩者混為一談，將誤導「環保運動」的方向。柴松林昨天在環境教育研討會中指出，最近幾年，反公害的自力救濟事件層出不窮，而事件參與者及媒體報導，多慣稱這種自力救濟事件為「環保運動」，這是極為不當的誤導（聯合報 1990/2/24）。

在南韓早期（1970 到 1980 年代中為止）的工業污染案例中，污染的賠償費與居民的搬遷費從一開始就威脅著都市知識份子與污染受害者的聯盟關係。一位南韓環境運動的研究者描述了一些早期案例：

8 污染求償的活動以 1988 年的林園事件為分水嶺。林園工業區因排放廢水入海，造成汕尾漁港魚群大量死亡。漁民的抗爭行動造成十八家石化業者停工，包含對下游產業的衝擊，每日停工的損失估計約四億台幣。中央政府立即介入調停，地方派系也從中穿梭，最後的賠償金由一億新台幣上跳到十二億七千萬新台幣（聯合報 1988/10/14, 1988/10/21；何明修 2006: 130）。

答：溫山(Onsan)那個案子〔於 1985 年中發現數千居民受到重金屬污染的威脅〕，污染研究院〔南韓最早的环境運動組織之一〕和居民合作，但是他們的利益是不一樣的，污染研究院是反政府、反污染的團體，執政黨想盡辦法要破壞居民和污染研究院的合作關係，用錢補償居民受害者，還有讓他們搬到別處去。

問：大部分的居民都拿了錢搬走嗎？

答：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搬走。韓國的農民和漁民非常窮困，向上流動的機會很少，而且他們都想搬到城市裡去住。在東河那個案子裡，很多居民甚至是支持那個開發計畫的，因為這樣他們可以拿錢走人，他們想搬到城裡。

從其他的訪談資料和污染抗爭事件的紀錄中，污染受害者的「物質考量」也常被指為破壞城鄉反污染聯盟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補償費、搬遷費等物質考量，使台、韓知識份子與污染受害者合作一事上審慎遲疑，以台灣來說，一個相對完備的環保行政系統的出現則是一種外在的拉力，把污染受害者從這個與知識份子的鬆散聯盟中拉開。當環境影響評估、各種監測系統、環境爭議處理、污染賠償機制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到位（何明修 2006: 158），而企業本身為減低居民怨懟所執行的「睦鄰政策」與公關活動，也成功收編地方利益，削弱了地方環境抗爭的動力(Ho and Su 2008)，在這個脈絡下，污染受害者有了直接或間接的制度管道去宣洩與處理他們的怨懟，使用制度外手段——例如和非官方的環保團體合作——的需求急速降低。如同台灣一位環保份子所言：

環境改變了，以前環保聯盟會收到很多地方公害的案子，要我們去支援，現在反公害的案子，他們自己地方就可以處理，不再需要台北來的知識份子下去背書。一小部分的案子還是會到環盟來，但數量少很多，地方反公害的案子，地方

就已經處理，很快就得到政府機關和立委的重視來處理。
(訪談，台北，2002/11/2)

隨著都市知識份子與污染受害者的聯盟關係逐漸解體，當地方性的公害抗爭事件透過公害糾紛處理機制或是企業本身的睦鄰計畫得到解決，不再一如 1980 年代的地方公害案件擴大演變成全國性事件，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逐漸把焦點轉向生態、保育議題上。這部分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觀察，第一個層面是比較 1970、1980、1990 年代環境抗爭議題的變化，第二是不同年代由環保團體主導的重大環境爭議案例，其論述內容的變化。以台灣的例子來看，如果我們比較 1976（中國時報全國及地方版資料）、1986（蕭新煌 1988）、1996 三個年份的所有抗爭事件與案件（何明修 1999，附錄四；蕭新煌 1997a），1976 年的 23 件抗爭與陳情事件全部屬於抗議已經發生的公害，1986 年的 25 件抗爭個案中，除了杜邦和其他一兩件屬於事前預阻個案外，其他都是抗議既有公害，而且論述內容、主軸非常清楚，都是要求管制污染與賠償。到了 1996 年的 136 個個案中，根據何明修的分類，其中有 32 個屬於事前預阻，僅有 6 個屬於生態保育議題，乍看之下公害議題仍然是 1990 年代環境抗爭的主流。但一項不該被忽略的現象是，占將近四分之一的事先預阻、反對重大開發案的環境爭議，在論述內容上有了調整，反對開發的理由，不再只如同杜邦案時主打可能的公害危險與當地的經濟產值，對於生態環境或是人文社會條件的保育論述，開始被大量的使用，這在濱南案、美濃水庫、南橫快速道路看得尤其清楚。

在南韓的部分，在歷經 1980 年代中後期的反公害、與能核電廠附近居民攜手的反核能污染的激烈抗爭，環境團體參與 1992 年里約的地球高峰會是環境運動的重要轉捩點，在此之後南韓環境議題著力於生態保育的面向，而且積極建立跨國、全球的環境議題連結(Kong 2004; Ku 1996b)。如果我們觀察南韓重要環境爭議案例，特別是由環保團體所主導的案例，反污染議題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而生態保育

議題則越發顯著。另一個有趣的指標是，南韓的旗艦級環境運動組織在 1993 年更名，由韓國反污染運動協會(Korean Anti-Pollution Movement Association)改為韓國環境運動聯盟(Korean Fe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KFEM)。「反污染」這三個字從組織名稱上移除，其實象徵了環境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專注於森林、水源、野生動物棲地、濕地，以及其他「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議題（訪談，首爾，2003/4/18）。除了污染議題的比重降低之外，南韓環境運動中向來與公害、污染議題緊密連結的核能議題，其重要性也逐步下降：

在 1990 年代早期，反核是韓國環境運動聯盟(KFEM)活動組的一個主要團隊之一，雖然只有兩位組員，但不論如何我們一直都有一個反核組在那裡。現在，我們只有一個人負責反核議題，而且是屬於政策組下的一個組員。這個轉變，代表我們的組織裡不再有反核組，只有一位反核的組員，這也表示反核不再是這個組織的核心議題。（訪談，首爾，2008/4/18）

從 1990 年代初期，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皆高度仰賴生態保育的論述來對抗重大的開發計畫（表一僅簡單列出兩國這段時期主要的幾波生態行動）。在對抗興建巨型工業區、水庫、快速道路時，環保份子以「保護瀕臨絕種珍稀動物」、「保存生態物種多樣性」、「保存海口濕地」來組織公眾支持，並回擊發展至上主義。

在都市知識份子主導了環境運動之後，論述能力被廣泛運用在各個層面。⁹ 首先，規模較大的環境團體設立研究中心來處理各種環境議題與政策，規模較小的非政府組織則專注於特定的環境政策領域。

9 李丁讚、林文源在討論台灣環境抗爭組織技術的轉化時，曾提及類似的轉變：(1)在抗爭策略上，由武力抗爭轉向「深入國家內部進行協商遊說」，在抗爭場域上，「由街頭轉向室內，文鬥取代武鬥」(2003: 89)；(2)在專業經理階級掌握了台灣環境團體的領導職位，「進行專業遊說、發表文字聲明或舉辦各種說明會等，都是這些領導人的專長」(2003: 92)。

表一 一九九〇年代對抗開發計畫的生態保護動員活動

年份	台灣	年份	南韓
1992	反對濱南工業區毀壞海口濕地，並危及珍稀鳥類（黑面琵鷺）全球最大之冬季棲息地	1994	洛東江(Nakdong river)與漢江(Han river)保育計畫
1993	反對興建美濃水庫，將淹沒五千萬隻蝴蝶之棲地	1995	反對於德裕山(Mt. Dukyu)興建滑雪坡道
1994	反對興建南橫高速公路，破壞大武山生態保留區	1996	反對在國家公園內興建高爾夫球場
1995	反對興建瑪家水庫，掠奪魯凱與排灣原住民棲地	1998	反對興建東江(Dong River)水庫
1996	反對於新竹香山濕地興建工業區	1998	反對新萬錦(Saemangum)濕地填海計畫

再者，環境團體的新聞稿、政策研究均高度仰賴科學與專業術語來建立公信力。第三，兩國的環境運動均極其依賴媒體來傳散訊息，越來越多的人力資源用於鑽研公關活動的技巧，撰寫吸引人的聲明稿、新聞稿，以及創造「新聞性」(newsworthiness)。

在兩國的環境運動致力於極大化理念力之後，就如同兩國的勞工運動一般，他們也面對極大化策略的非意圖後果。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環境運動有極高的社會支持率，¹⁰ 不像勞工運動被高度污名化。但反過來說，當環境運動說服了所有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環境價值也成為所有人皆可取用的公共財。當國家、資本家也開始廣泛使用各種環保意象或生態價值來支持其行為，¹¹ 環境運動開始面對新的難題。新的難題可以分成兩方面：(1)在環境議題的詮釋權上，環境運動面對新的制度競爭者(institutional competitors)；(2)在牽涉經濟利益衝突的環境案例中，環境運動無法有效地組織公眾意見。在制度競爭者這點

10 根據 1991 與 1992 年的兩份民意調查，其中關於一般民眾對不同社會運動的支持度（蕭新煌 1994: 49），環境運動的支持度連續兩次居於榜首，支持率高達 87.7%。勞工運動則分別列名第七(1991)與第八(1992)，支持率均低於 50%。在南韓方面，我們缺乏類似的民意調查資料，但是根據諸多學術與一般報導，南韓的環境運動是最具影響力也最受民眾歡迎的社會運動之一（Kim 2000; Kong 2001; Ku 1996a; Lee 2000）。

11 一位南韓的運動者說：「現在企業界表現得一副他們真的關心環境的樣子，前陣子有個廣告，『興建高速公路，我們對環境友善』老天！建高速公路怎麼可能對環境友善？可是大部分的建設公司都這樣做宣傳」（訪談，首爾，2003/4/18）。

上，大企業開始設立自己的環境政策研究中心或智庫（南韓），¹² 或者砸大錢做公共關係（台灣與南韓）；環境顧問、工程公司開始大量出現（台灣）；¹³ 政府部門也設立環保行政系統與多種含納環保專家的諮詢委員會。重點在於國家與資本家開始進軍環境論述的言論市場，要重新奪回對「污染」、「保育」、「環境管理」的詮釋權。雖然建構一個完備的環保行政、諮詢系統，一開始只是回應環境運動事權統一、決策透明化的訴求，但長期來看，這些新的制度安排卻成為與環境運動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工具。

除此之外，台灣與南韓政府或邀請環運份子擔任地方或中央層級的環境行政機構首長，台灣與南韓均有環運份子擔任環保署長、環境部長的前例。或以「公共參與」、「透明決策」為名，積極招募活躍的運動份子進入各種環境諮詢、管理委員會，層級最高者直屬大統領或行政院長（如南韓與台灣的永續發展委員會），還有許多在環保署、環保部之下的諮議機構。據台灣環境運動的一位資深領導者所言，「進入體制」對環境運動的衝擊，是「焦點變了」：

問：當初環境團體抗爭的一部分是，不管重大開發案或國家的發展環境政策，基本上是不透明的，他們就要求要透明，公開讓民間參與，現在他們改變了，民間團體有參與的空間，你覺得這對環境運動有什麼影響？

答：對環境運動的影響來講，就使得這些團體的運動性降低了。現在這些團體比較在枝節的問題上，像如何去落實某個措施，我想這也是自然發展，本來鼓吹大家做回收，政府不太重視，然後又覺得要做回收，接下來我們怎麼來回收……他就叫你進來看看怎麼做比較好。我想

12 以目前資料所及，已設立環境研究機構的南韓財閥企業包括三星電子(Samsung)、LG、現代集團(Hyundai)、SK、斗山(Doosan)、韓化(Hanhwa)，現代與三星更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經成立。

13 根據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的資料，從1981年的24家創始會員，至2004年為止，該公會共有530家會員，平均來算，以年增20家的速度成長。

這也是個階段，運動團體到目前這個階段，運動性降低了，執行面的問題增加了。（訪談，台北，2004/11/4）

另外一位進入台灣行政體系的反核運動者補充：

其實環境運動永遠是社會制度執行者跟規劃者的敵對，進入到體制裡邊，馬上就跟外界的環境團體，角度完全不一樣。對我來講，這也是一個正常、也是自然的現象。他留在民間團體，他是一個社會的防腐劑，進入到體制裡邊就有腐化的可能，他不見得會腐化，但就有腐化的可能，因為他要對整個國家政策整體做辯護，特別像現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你勞工的問題，他一定不能太堅持，他一定要考慮到資方的利益，環境的問題，他也要考慮到資方的利益。被吸納到體制內的就有違反原來初衷的可能，留在外邊的他永遠可以做為防腐劑。（台北，訪談，2002/12/5）

當新的制度競爭者出現，組織公眾意見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這也是台灣與南韓環境運動的第二項挑戰。在某些有高度社會共識的環境議題上，例如環境影響評估或較嚴格的污染管制，政府成立新的行政機構接手這些工作。但高度爭議的議題上，例如核能，新的制度競爭者也進行動員、尋求社會支持，環境運動若無法取得明顯的民意優勢，就演變成漫長、困難的論述與組織戰。但環境運動的實力基礎——理念力——並不是奠基於持久性的社會關係，例如親屬或工作關係，而是一套想法、理念的說服力。當論述戰無法主導公眾意見，又缺乏堅實的草根、社會基礎來反制競爭對手時，環境運動則顯得相對無力。在運動低潮期，常可聽到運動者說這樣的話：

它沒有力量啊。環保運動這幾年就會變成這樣。你講的也不單純是工運，你看農運，農運從來不是議題上政府讓步，應

該是以這個職業裡面的人，這個職業裡有人的時候政府會介入，環保運動的確是面臨這樣的困境，它沒有啊。這幾年的環保運動的確是走下坡，最主要就是這個問題，你沒有很清楚的對象、人在裡面，你通常是議題，不特定的人，所以你不會對政府造成什麼太大的壓力。（訪談，台北，2008/1/8）

另一位南韓的環境運動者說：

說得現實點，如果一個環境運動無法好好組織人們的意識與憂慮，它就只是隻紙老虎。在某些議題上，我們〔環境運動〕幾乎好像要改變整個世界，但在許多其他議題上，我們只是一隻紙老虎。（訪談，首爾，2003/4/18）

在轉向生態、保育議題之後，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都面臨與草根疏離的問題，這是為了捍衛環境運動的理念力，與代表「自利」的污染受害群體作切割所付出的代價。一位南韓環境運動聯盟的幹部說：

從 1980 到 1990 年中期，我們組織裡面有一半的人是在外面跑的，和地方的民眾碰面聊天，做組織工作。但是現在，絕大部分的人都黏在桌子邊，寫聲明稿、講電話。這其實告訴我們什麼事情變了，大的趨勢是什麼，還有我們的問題在哪裡。我們越來越像辦公室白領，而不是組織工作者。（訪談，首爾，2003/4/18）

另一位台灣的環境運動工作者在提到環境團體的分類時也說：「台灣大概會這樣分吧，生態保育為主的，以政策法規為主的，我覺得草根運動的已經非常少了」（訪談，台北，2003/1/8）。

在某種意義上，環境團體與草根的斷裂，使得許多牽涉弱勢族群

經濟利益的環境議題更加難解。台灣的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和南韓的新萬錦濕地保育計畫可說是經典案例。在國家公園的例子裡，台灣的環境團體企圖保存四萬六千公頃的檜木森林，「是全世界唯一一片同質的紅檜與黃檜的巨型森林……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訂之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Taipei Times 2000/12/21），但是馬告國家公園的設立侵犯了當地原住民的居住及狩獵權。在新萬錦濕地的案子裡，南韓的環境團體反對填海來建造新的工業區，但是該區居民（全羅北道）長期為區域發展不均衡所苦，反而歡迎這項開發計畫。其他永續性與經濟生計的衝突，例如台北市建造都市公園的案例裡，牽涉到驅逐數千貧民窟居民；而首爾市中心為人稱頌的清溪川整治計畫，則是拆掉一條市內高架道路、關閉一座歷史悠久的跳蚤市場，以及驅趕七萬三千名路邊小販。在這兩個案例裡，環境團體均支持市政府所主導的高度商業化的「綠色計畫」，而在貧民窟居民和街邊小販的議題上保持緘默(Liu and Choi 2004)。

除了無力處理弱勢族群的經濟利益問題，兩國環境運動在與企業利益對抗時，則是不斷戰敗。南韓的環境團體在朝生態議題轉向之後，企業的環境舉措基本上從環保團體的監測雷達上消失。即便環境團體偶爾攻訐財團的污染行徑，這樣的案件通常無法得到大部分南韓媒體的青睞，原因是南韓財閥的多角經營或是涵蓋媒體，或是媒體的廣告金主；而以環境運動對媒體的依賴程度，鬥爭大企業的活動多以失敗告終。在台灣方面，主流環境團體也被批評對自由市場經濟的邏輯舉手投降：

他們〔主流環境團體〕是可以接受在貢寮那邊蓋天然氣發電廠，可是你的反核變成什麼？你的反核就只是我不要核能，其他什麼都可以嘛。在反核我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核能電廠的出現就是要廉價大量的電，所以我覺得看核能的問題不只是看你最後用什麼電去取代，而是看結構上整個台灣需不需要那麼多電。我必須說在外面你看不太出來，因為他們寫

的論述絕對要比這個要激進很多，可是在最後的策略上是，以前國民黨時代看不出來，但現在就很清楚他們在裡面推動的是什麼東西，就是民營電廠，就是自由化競爭，台電不要壟斷，那核能電廠自然就，在所有的考量之下你會發現不便宜、不經濟……就是〔主流環境團體〕比較是自由主義、比較用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待環境問題。（訪談，台北，2003/1/8）

以上的討論呈現出一個諷刺的對比。如果環境運動可以以一種威脅他人生活的方式，把特定的生態期望強加在經濟弱勢者身上，但環境運動卻無法對經濟優勢者做同樣的事。

新的制度競爭者、多元的環境論述市場，組織公眾意見的困難，環境議題中的經濟不平等問題，這些新的挑戰迫使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嘗試新的運動策略來克服理念力的流失，這些新的嘗試可以被歸成兩類：專業化和重建草根連結。專業化主要是針對環境論述市場中的新競爭者，一位台灣環保團體的執行長說：

現在不像威權時代，可以靠民意、靠動員把政策擋下來，一個環保團體你要面對政府、學術單位、龐大的資本家，這三者他們要拿取或整合資訊，都比我們更容易，你如果今天議題上沒有很強的論述能力，包括資料等等，你很難去跟專業的科技官僚，不要說在運動領域上跟他對罵，你連跟他彼此對話的能力都沒有，這就是很殘酷的事實。有些科技官僚，他在環保署一幹就十年，有些學者這個問題一研究十年、二十年，或他常在國外開會，他拿的是最update的東西，你跟他談搞不好是1985、1995的，他拿的是2002、2003的。在議題資訊上，這是最基本的功夫，包括從早期也是一樣，早期說反六輕，宜蘭的朋友透過李界木把美國的資料帶回來，他們才有可能跟王永慶談，在今天也是一樣，以前的〔運

動] 成員是教授，本身行有餘力，要拿資訊〔也很方便〕，今天不是，這些人就是工作者，本身要去把教授所扮演的角色轉移到自己身上，他們也要有論述的能力，他們也要扮演一個最基本的組織串連的工作。但如果前面這一段沒有弄好的話〔資訊、論述〕，你也沒辦法去做組織串連的工作。
(訪談，台北，2003/2/21)

重建環境運動的草根連結，則是把多元經濟利益重新整合進生態、環保議程的一個重要步驟。從 1990 年中期開始，南韓的環境運動在學生和勞工運動背景成員的不斷鼓吹之下，開始積極地招募會員，企圖建立雄厚的社會支持基礎，到 2006 年為止，南韓環境運動聯盟的全國會員數已經突破十萬人。而環境運動者在面對大企業的環境舉措時，心態也有所調整。一位任職於企業環境政策智庫的運動者說：

答：從 1990 年的早期到後期，〔環境運動〕一直都是主要在和國家作戰，許許多多的示威、抗議，和警察打架，剃光頭等等。但現在大家理解到，全球化越往前走，企業實際上更強大，我們現在應該更提防大企業〔的作為〕，他們可能比國家還有權力。

問：所以之前運動的對手是國家，現在轉換成大企業？

答：對，現在變成企業。(訪談，首爾，2003/3/26)

除此之外，南韓的環境團體開始和工會建立連結，企圖將環境議題帶入工會的議程中：

在一個南韓發電廠的案子裡，有些關於私有化的辯論。首先這是寡占事業，環境運動基本上是贊成私有化的，但是工會則持反對立場。一開始環境運動和工會之間有很大的爭執，

但現在我們有了一些共同討論的基礎，我們現在仍然和工會保持很好的關係，我們明白工人同樣是污染受害者，而工會那邊也瞭解環境議題是很重要的，兩邊有定期舉行討論會。對我個人來說，如果繼續這樣走下去，我們和工會將找出一些共同的議題和利益，在某些事情上，我們和工會有很意識形態的辯論，情況通常會很困難，但在其他事情上我們有共同的基礎，我們可以聯合、合作。（訪談，首爾，2003/3/26）

在台灣，積極募集大量會員並不是擴展草根最主要的策略，而是由許多分散的小團體根植於個別、特定社區，或將環境議題與當地文化社區問題做結合，或是拓展環境議題的廣度與深度。美濃愛鄉協會是一例，將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運動，與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有機農業、客家文化做結合（何明修 2006，第七章）。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則是在核四建廠址的貢寮進行長期的草根工作，而他們所謂的草根：

我們〔運動團體的工作者〕去地方永遠不會是我們在發言，而且我們跟他們〔在地社區居民〕學了很多東西……我是覺得跟他們非常頻繁的互動。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從來不會去動員他們，就是說我們會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但是最後要不要、怎麼動是在他們身上，或者說有時候是互相動員……如果你有機會去瞭解，你會發現〔社區居民〕論述的多元跟包容遠超過單一運動裡面的談法。（訪談，台北，2008/1/8）

近年來，這個團體也積極訪談台電核一、核二廠的歲修工人，追蹤他們受輻射污染的程度和健康狀況。除了重新建立與草根的連結之外，大企業的環保舉措也是重要關注焦點。1998年台塑集團輸出三千噸汞

污泥到柬埔寨非法傾倒的事件，就是由台灣的綠色陣線所揭露，後續的國際譴責與抗議迫使台塑收斂其污染輸出的行徑。環運工作者也開始思考與尋求和工運聯手的可能性，其中一位說：

〔勞工和環境〕共通的地方當然他們都是〔生產〕成本，勞動跟自然資源其實都是成本，當你在追求最高利潤的時候，你就想如何把這兩個成本一直壓下來。大家都會講自然資源是不可移動，人是可以流動的，其實不是這樣子，因為很多外在的機制讓這兩個東西流動，尤其是自然資源，透過期貨，甚至是 quota 配額二氧化碳的，這樣來講，它也是可以流動的。早期這兩個〔勞工和環境〕當然會有對立，工業化的社會裡面越多的開發，他需要越多的勞工，對自然資源的衝擊越大。但是反過來講，某個地方會產生微妙的結合，譬如說當你這個自然資源越枯竭的時候，去採集這些自然資源的勞動條件會越險惡，風險就越大，譬如說大陸煤礦工人的意外越來越多，這代表他已經挖到很深的地方，自然資源面臨一定程度的枯竭。這兩個東西到後來竟然有可能變成是一樣的東西，就某種指標來說是一樣的東西。這也是我覺得環保運動跟勞工運動在我現在來看，這兩個運動怎麼去對話特別迷人的部分。（訪談，台北，2003/1/8）

另外一位台灣的環運工作者說：

我認為工運跟環運，如果是發展比較成熟，到最後他目標應該都是一致的，所謂目標一致就是經過工業化這樣一個結構性的改變，後來會牽涉到一個資本累積的問題，資本累積對工運朋友來說，他們可能碰到一個資本家，怎麼管理資金土地操作去玩資本遊戲，這些問題後來也會出現在環運的領域裡……到最後〔工／環〕變成同一個問題，就生活環境來

說，工廠環境不好的話，工人也會碰到污染的問題，附近民眾也會碰到污染的問題……兩邊運動者能不能在操作面有共識，如果連這些都沒共識，根本很難去動員底下的人。第一個問題，在工運裡面他們很少去談到衛生的問題，很少用一個環境的角度來談工人的工作權利，環境權還沒有被放進工運裡面，這是我們一直嘗試在跟工運朋友談的，希望以後能把這個放進來……從桃園RCA事件，看到很多工人跳出來，只是工人跳出來的時候，運動的主訴求，我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重點是放在受害者的賠償，工業傷害的賠償，而不是工業環境的改善。在台灣這樣一個運動目標上，工人跟環境的訴求還是不一樣的……就遠的目標來說，其實這個差距有可能被拉低、被縮小的。（訪談，台北，2003/2/21）

在此我們看到台灣與南韓環境運動的類似回應。面對環境論述市場上新的制度競爭者與越來越難組織的公眾意見，這兩組環境運動或透過積極擴張會員基礎或社區組織行動，來拓展其對國家與資本家的制衡力。大企業的環境舉措再次成為環保團體的關注焦點，而環境運動者也開始尋求和組織勞工合作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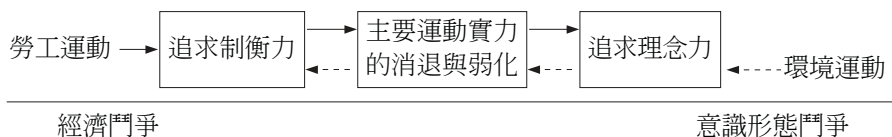
四、小結

本文從運動實力的角度，敘述了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的故事。勞工運動企圖極大化在經濟場域中的制衡力，而環境運動致力於擴張意識形態場域中的理念力。一旦這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開始奏效，勞工與環境運動均面對原初運動實力流失的困境。面對勞工與環境運動所提出的經濟與道德挑戰，國家與資本家一方面詆毀並在組織層面上瓦解工運的支持基礎，另一方面則與環境運動競爭環保、生態論述的主導權。面對這些反制行動，工運致力於取得論述、理念的力量來彌補制衡力的流失，而環運企圖拓展草根、強化組織制衡力來彌補理念力的

弱化。把勞工與環境運動的這兩條軌跡並置，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如何成為彼此的鏡像(mirror images)（見圖四）。

從運動實力觀點來觀察運動的發展軌跡究竟有何意涵？以下作者從社會運動文獻、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與社會動員的實踐三方面來說明。

解釋勞工與環境運動這兩條獨特的運動軌跡，讓我們看到既有文獻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在西文文獻部分，如果用最精簡的方式來說，既有解釋運動長程發展的論點可以分成兩種，一是以組織為分析核心，二是以制度為中心。第一種取徑主要在討論「組織」作為一種行動工具，長期來說究竟是壓抑、偏離原先的運動目標，抑或是提升社會運動的動能。主張組織發展有害於運動進程，我們馬上可以想到「寡頭鐵律」(Michels 1962)、「循化」(normalization)的危險(Piven and Cloward 1992)；主張組織對運動發展的良善性，也可見諸對正式化(formalization)與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討論(McCarthy and Zald 1987a, b; Staggenborg 1988)。在論爭兩端，也有主張「寡頭鐵律」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過程，進而提出運動與組織「重生」(revitalization)的具體案例並分析其轉變的機制(Voss and Sherman 2000)。第二種以制度為中心的取徑是置放在「社會運動成為被認可的政治行動者的過程和機制」的理論背景裡(Shorter and Tilly 1974; Tarrow 1989, 1994; Tilly 1995, 2004; Tilly et al. 1975)。根據 Charles Tilly 的說法，社會運動是十八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的一種新型公共政治，他所關注的運動長程發展，是這種新的、透過集體行動的非制度性的宣稱手段(forms of claim-making)如何被標準化並且成為政治決策的一部分。基本上這是社會運動如何制度化的分析。Sidney Tarrow 對抗爭週期的分析指出，隨著抗



圖四 工運與環運軌跡的並置

爭活動的擴散，行動取向會出現激進派與溫和派的兩極分化，而結果可能是體制的崩潰或新體制的鞏固（西德尼·塔羅 2005: 198, 214），但 Tarrow 卻在運動結果的部分強調，雖然許多運動要的不只是改革，而是根本的社會變遷，但是抗爭和運動不斷被整合進既有的政治過程中，溫和的改革卻是最可能的鬥爭結果，「儘管在高潮時，運動的力量是驚人的，似乎不可逆轉，最後卻被政治程序侵蝕與吞沒」（西德尼·塔羅 2005: 236）。

本文對社會運動的長期發展則提出一個不同的解釋。既有的兩種詮釋用普遍性的概念（例如制度化或專業化）廣泛地套用在所有的社會運動上，卻沒有處理個別運動的特性，以及運動之間的差異性。即便如 Tarrow 提及抗爭週期可能導向體制的崩潰或鞏固，但這仍然無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工運與環運會有不同的發展歷程，也沒有解析導向不同運動軌跡的機制為何。本文企圖彌補這些空白，以工運與環運的不同實力基礎作為自變數，來解釋工運與環運的不同發展軌跡。

在與本土經驗研究的對話方面，台灣工運與環運的個案研究已累積到一定程度（王振寰、方孝鼎 1992；李丁讚、林文源 2000, 2003；李允傑 1992；何明修 2006；何雪影 1992；范雲 2000；徐正光 1990；趙剛 1995；蕭新煌 1988, 1994, 1997a, 1997b），作者以比較研究的形式來呈現東亞個案所蘊藏的理論可能性。這項比較，並不是台、韓兩國的同一運動比較(Buchanan and Nicholls 2003; Chu 1998; Huang 1999; Kim 2000; Lee 2006; Weller 2006)，反而是以不同國家的運動個案，來架構一個「跨運動」的比較研究。這樣做的目的有二：(1)過去的台、韓同一運動比較研究，都著重解釋工運之間的差異，或者是環境運動之間的差別，本文則指出，兩組工運在組織實力、強悍度上的差異固然存在，但如果轉換一個比較的參照點，在跨運動的比較裡，我們更會看到兩地工運的類同性，以及工運與環運之間的差異性，也就是說，新的比較觀點讓我們看到不同於過往的經驗風景。(2)系統性的跨國、跨運動比較即使在西文文獻中仍是鮮少研究的主題（目前的例外大概只有 Rucht 1996; della Porta and Rucht 1995; Kriesi et al. 1995），

如果能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亦可建立東亞經驗在社會運動文獻中的顯著位置。

如果到目前為止「運動實力」在解釋勞工與環境運動的發展軌跡上是個有效的概念，那麼這種分析的類推性為何？以運動實力為中心的分析架構，可以運用到工運與環運以外的其他運動上嗎？在類推性這個問題上，有幾個值得探索的選項。第一個可能性，是把制衡力與理念力想像成光譜的兩端，如果工運與環運分別是這兩種運動實力的極致代表，其他社會運動則是介於光譜的中間。第二個可能性是去區分制衡力與理念力之下的次類型。環境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可能倚賴不同形式的理念力，因為後者主要是在對抗刻板印象、污名化，以及建立正面、新的認同。同樣的道理，組織性勞工的制衡力也和學生占據校園、消費者的產品抵制、其他窮人運動所使用的擾亂性行動有所不同。第三個可能性是去尋找制衡力與理念力之外的其他力量來源；這個議題基本上超出本文的範疇，但仍然是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如果換個角度來思考類推性，其他國家的勞工與環境運動，和本文所呈現的台灣與南韓經驗，可以有新的對話。事實上，台、韓工運、環運所共享的運動軌跡，在其他國家的運動發展歷程中，似乎並不陌生。在勞工運動的部分，將社會運動的發展視為一個不斷克服障礙的歷史過程，其實是研究美國勞工運動的學者所提出的 (Lopez 2004: 218)。而美國過去近二十年來的「新工會運動」，也源起於勞資雙方自新政時期(New Deal)所建立的社會契約關係被資方片面打破，而從1970年代開始，資方與保守勢力對工會進行強力的意識形態攻訐，造成工會的制衡力不斷流失的危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才由幾個進步工會帶頭，開始了一波又一波的集體行動、論述戰和公共結盟的行動(Chun 2005; Clawson 2003; Fantasia and Voss 2004; Voss and Sherman 2000)。環境運動的部分，日本的环境運動在1970年代反污染行動達到高峰之後，受制於公眾對環境議題興趣的減退，與「自民黨對污染危機相對迅速且完備的法制與行政回應」(Mason 1999: 189)，整個1980與1990年代呈現停滯與衰退。這也是另外一個例證，說明了環

境運動非意圖地創造了強大的制度性對手，而緩慢地喪失了對公眾意見的主導權。其他國家的運動發展歷程，也提供了進一步反省台灣與南韓運動經驗的材料與養分。

在社會動員的實踐層次上，工運與環運的發展軌跡是個「彼此趨近」的過程。在面對和克服挑戰的過程裡，他們必須取得對方的長處和強項，來彌補自身的不足；他們也必須進入一個新的鬥爭場域，而對方在其中已浸淫多年，且小有成果。雖然目前完全看不太出一個紅綠結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最起碼，勞工與環境運動的組織者可以開始同情式地理解彼此所面對的難題，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有很多可能性值得去開發。

作者以最後兩點來為本文收尾。首先，以「運動實力」做為核心概念來重新理解社會運動現象，運動軌跡的分析只是一個起步。如果在運動軌跡這個案例上，「運動實力」的動態發展可以更細緻地呈現運動主體如何在不同歷史時段，根據內外部的結構條件進行策略調整和組織改造，那麼，「運動實力」也有同樣的理論潛力來關照社會運動研究中其他重要主題。以運動的發生為例，「政治機會結構」將無法全然地適用到不同的社會運動，因為在同樣的「政治機會結構」之下，有些運動早發生，有些運動晚出現，更關鍵的，反而是在同一個歷史時期中，哪些運動的實力基礎被削弱與約制，而其他運動卻相對有較自由的空間匯聚力量。

最後，也許不是所有人都關心社會運動和它的發展。但無可諱言的，我們的生活周遭充斥著社會運動的影子和遺跡。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週休二日和資源回收，是因為勞工與環境運動的強力介入，把這些二、三十年前無法想像的生活形態，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變成生活中的現實。關心社會運動的發展，關心運動的軌跡，其實，也就是在關照未來二、三十年社群生活的內容和品質。

誌謝：本文英文稿受益於 Elizabeth Popp Berman, Michael Burawoy, Peter Evans, Matthew Garrett, Elizabeth Perry, Lisa Stampnitzky, Robert Wellers, Erik Olin Wright

等諸多師友的評論。英文稿亦曾受邀於布朗大學 Watson Institute 的 Colloquium on Comparative Research 宣讀。中文文稿部分，感謝藍佩嘉、許雅芬與夏傳位的建議與校訂，以及兩位匿名評審的建議，在此一併致謝。文稿疏漏之處，由筆者負全責。

airiti
參考文獻

- 王振寰、方孝鼎(1992)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3: 1-30。
- 西德尼·塔羅(2005)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南京：譯林。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源頭：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19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 133-206。
- (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52: 57-119。
- 李允傑(1992)台灣工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巨流。
- 李建昌(1991)八〇年代的台灣勞工運動——結構與過程的分析。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明修(1999)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台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6)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
- 何雪影(1992)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鄭村棋、舒詩偉等譯。台北：唐山。
- 吳乃德、廖錦桂(1991)帝國大反擊：解雇工運幹部、勞資關係法、和階級衝突。勞動市場與勞資關係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吳介民(1990)政體轉型的社會抗議：台灣 1980 年代。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柯志哲(2008)我國使用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探討——使用情況與決定因素。解嚴二十年台灣社會的整合與分歧，2008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
- 范雲(2000)從政治人到階級人：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工運領導。見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頁 177-230。台北：巨流。
- 徐正光(1990)從異化到自主：台灣勞工運動的基本性格和趨勢。見徐正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103-125。台北：巨流。
- 張晉芬(2001)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趙剛(1995)1987 年的台灣工會、國家與工運——以遠化工會的個案為例。見徐正光與蕭新煌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頁 115-150。台北：東大。
- 聯合報(1988)圍堵 又一天：工廠冒煙 鄉民冒火 一百多人硬闖 拿切結書才走。10

月 14 日。

——(1990)解決公害糾紛事件的根本作法——「林園模式」的反省。10月21日。

——(1990)自力救濟不是環保運動。2月24日。

——(1996)「工作被外勞搶光了」、「誰來同情我們這群歐巴桑」：中年失業勞工道出飯碗悲情。4月10日。

——(1996)聯福員工攔火車一度阻斷鐵路交通。12月21日。

蕭新煌(1988)七〇年代反汙染自力救濟的結構與過程分析。台北：行政院環保署。

——(1994)台灣民眾對社會運動的瞭解與支持：變與不變。見伊慶春編，台灣社會的民眾意向：社會科學的分析，頁41-64。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997a)台灣地方環保抗爭運動：1991-1996。台北：行政院環保署。

——(1997b)一個緊張的共生關係：環保行政機關與民間團體的合作關係。台北：行政院環保署。

Ahn, Joyup (2001)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Alternative Employment Arrangement in Korea: Definition, Trend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Paper presented at KLI-CALSS workshop on Nonstandard Workers and Policy Directions. https://www.kli.re.kr/_FILE/ENGWORKINGBOARD/b91bb4d61d95b57c1bd4af9b6ab9fc40.pdf

Bloch, Marc (1967)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Pp. 44-81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Bramwell, Anna (1994) *The Fading of the Green: The Decline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andt, Vincent (1987)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eased to the Nautilus Institute under the U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http://nautilus.org/foia/Rok_Students.pdf

Brenner, Robert (2007) Structure vs. Conjuncture: The 2006 Elections and the Rightward Shift. *New Left Review* 43: 33-59.

Buchanan, Paul G., and Kate Nicholls (2003) Labour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8(2): 203-237.

Calhoun, Craig (1993)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3): 385-427.

Central News Agency (2001) Labor, Environmental Groups Protest Outside EDAC Site. August 24.

Cho, Young-rae (2003) *A Single Spark: The Biography of Chun Tae-il*. Seoul: Dolbegae

Publishers.

Chosun Ilbo (2003) Out to Ruin the Country? November 11.

Chu, Yin-wah (1998)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8(2): 185-202.

Chun, Jennifer Jihye (2005) Public Drama and the Politics of Justice: Comparison of Janitors' Union Struggles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 and Occupations* 32 (4): 486-503.

Chun, Soonok (2003) *They Are Not Machines: Korean Women Workers and Their Fight for Democratic Trade Unionism in the 1970s*. Burlington: Ashgate.

Clawson, Dan (2003) *The Next Upsurge: Labor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Dieter Rucht (1995) Left-Libertarian Movements in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Italy and West Germany, 1965-1990. Pp. 229-272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sping-Andersen, Gosta (1985) Power and Distributional Regimes. *Politics & Society* 14 (2): 223-256.

Fantasia, Rick, and Kim Voss (2004) *Hard Work: Remaking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lacks, Richard (2004) Knowledge for What? Thoughts on the State of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Pp. 135-153 in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 Structure, Meaning, and Emotion*, edited by Jeff Goodwin and James M. Jaspe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Goodwin, Jeff, and James M. Jasper, eds. (2004)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 Structure, Meaning and Emo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eirich, Max (1971) *The Spiral of Conflict: Berkeley, 196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o, Ming-sho, and Feng-san Su (2008) Control by Containment: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izing Pollution Disputes in Taiwa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40: 2402-2418.

Hobsbawn, Eric (1967)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1999)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Pp. 31-54 in *Asi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Yok-shiu F. Lee and Alvin Y. So. Armonk: M. E. Sharpe.
- Huang, Chang-Ling (1999) *Labor Militancy and the Neo-mercantili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Comparison*.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Jung, Young-Tae (2000) Labor Move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Global Neoliberalism: The Case of Korea. *Korea Journal* 40(2): 248-274.
- Katznelson, Ira (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nstructing Cases and Comparisons. Pp. 3-41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m, Mikyoung (2003) South Korean Women Workers' Labor Resistance in the Era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32 (1): 77-101.
- Kim, Sunhyuk (2000) Democra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is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35(3): 287-302.
- Kim, Yoo-Son (1998) Minjunojoundong'eui hyoksin'eul wuihan jae'eon [Suggestions for A Revitalization of the Democratic Labor Movement]. *Nodongsahoe [Labor and Society]* No. 25. http://www.ksli.org/pds/downadd.asp?wp_id=29
- Kong, Sukki (2001)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national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he 199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7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naheim, California.
- (2004) Empowering Local Environmental Activism through Transnational Mob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Kore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from Rio to Johannesburg. Paper presented at ISA RC24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 Seoul, South Korea.
- Koo, Hagen (200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rea Herald (2003) Troubled foreign firms. September 3.
- Korpi, Walter (1974) Conflict, Power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4): 1569-1578.
- (1978)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Korpi, Walter, and Michael Shalev (1979) Strikes,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2): 164-187.
- Kriesi, Hanspeter,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co G. Giugni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u, Do-wan (1996a) *Hanguk Hwankyeong Undong ui Sahoehak [Sociology of Kore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Seoul: Munhakkwachsosa.
- (1996b)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Kore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5(1): 155-180.
- Lee, Namhee (2001) *Making Minjung Subjectivity: Crisis of Subjectivity and Rewriting History, 1960-1988*.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History.
- Lee, See-jae (2000)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Korea and Its Political Empowerment. *Korea Journal* 40(3): 131-160.
- Lee, Su-Hoon (1999)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South Korea. Pp. 90-119 in *Asi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Yok-shiu F. Lee and Alvin Y. So. Armonk: M. E. Sharpe.
- Lee, Yoonkyung (2006) Varieties of Labor Politics in Northeast Asian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Union Activism in Korea and Taiwan. *Asian Survey* 46(5): 721-740.
- (2009) Divergent Outcomes of Labor Reform Politics in Democratized Korea and Taiw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4(1): 47-70.
- Lipsky, Michael (1968)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4): 1144-1158.
- Liu, Hwa-Jen, and Yeyong Choi (2004)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Compared. Paper presented at ISA RC24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 Seoul, South Korea.
- Lopez, Steven Henry (2004) *Reorganizing the Rust Belt: An Inside Study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ukes, Steven (2005) *Power: A Radical View*,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ason, Robert J. (1999) Wither Japan'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 Assessment of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Pacific Affairs* 72 (2): 187-207.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87a)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Pp. 15-28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 (1987b)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p. 337-391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 Mechanic, David (1962) Sources of Power of Lower Participants in Complex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7 (3): 349-364.
- Melucci, Alberto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chels, Robert (1962)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Montgomery, David (1995) *Citizen Worker: The Experience of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Democracy and the Free Marke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gle, George (1990) *South Korea: Dissent within the Economic Miracle*. London: Zed Books.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9)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92) Normalizing Collective Protest. Pp. 301-325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ucht, Dieter (1996)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ontexts on Social Movement Structures: A Cross-movement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Pp. 185-204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idman, Gay W.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rp, Gene (1973)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Part One: Power and Struggle*. Boston: Porter Sargent.
- Shin, Kwang-Yeong (2003)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in South Korea. *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 131-175.
- Shorter, Edward, and Charles Tilly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 Beverly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ggenborg, Suzanne (1988) The Consequenc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Formalization in the Pro-Choice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585-606.
- Taipei Times (2000) Aborigines Agree to National Park in Cypress Forest. December 21.
- Tarrow, Sidney (1989) *Struggle, Politics, and Reform: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1994)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rborn, Goran (1980)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Tilly, Charles (1995)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Great Britain, 1758-1823. Pp. 15-42 in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edited by Mark Traugot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Social Movement, 1768-2004*. Boulder: Paradigm.
-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London: J. M. Dent & Son.
- Voss, Kim, and Rachel Sherman (2000) Breaking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Union Revit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2): 303-349.
- Weller, Robert P. (2006)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James Q. (1961) The Strategy of Protest: Problems of Negro Civic Ac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 (3): 291-303.
- Wright, Erik Olin (2000)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5: 957-1002.
- Yu, Hyunseog (1995) *Capitalism, the New World Economy and Labor Relations: Korean Labor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D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